

# 瓦格納：為學術的一生

陳平原

从1992年初在北京中关村见面，到2019年4月28日在波士顿北家園餐厅外道别，二十八年間，我多有向瓦格納教授（1941—2019）請教的机会，如參加各種學術會議、委託指導博士生、应邀對方的大學講學，還有參與《晚明與晚清——歷史傳承與文化創新》（陳平原、王德威、商偉編，武漢：湖北教育出版社，2002）、《近代中國的百科全書》（陳平原、米列娜編，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7）、*Chinese Encyclopaedias of New Global Knowledge (1870—1930): Changing Ways of Thought* (editor: Milena Doleželová - Velingerová, Rudolf G Wagner, Springer-verlag, Berlin, Heidelberg, 2014)等書的編寫。作為漢學家的瓦格納，學識極為淵博，研究領域兼及中古哲學、當代戲劇，但最能體現其跨文化研究的貢獻，包括世界視野、理論意識以及學術組織能力的，是成就卓著的晚清媒體及思想文化研究——他與中國學界的密切聯繫及深遠影響，也主要集中在這方面。可以這麼說，最近二十年晚清研究之成為顯學，其眼界、方法及資料運用明顯上了一個台階，與瓦格納教授的提倡與引領有直接關係。

關於瓦格納教授的深厚學養、敬業精神、癡迷史料，以及“工作狂”，因夏曉虹在《漢學界的“廣大教主”——我眼中的瓦格納先生》（《讀書》2019年第8期）中有生動描述，故從略；我這裡就講與瓦格納教授最後的交往。

我們倆都關注晚清畫報，不同之處在於瓦格納教授專精，集中在《點石齋畫報》及其周邊，我則兼及清末民初百餘種圖文并茂的畫報。2018年秋，北京的三聯書店推出增訂版的《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》（比2008年香港三聯書店初版增加一半篇幅），我當即寄送瓦格納教授，因書中多次引述他的名作《進入全球想象圖景：上海的〈點石齋畫報〉》（“Joining the Global Imaginaire: The Shanghai Illustrated Newspaper Dianshizhaihuabao”，中譯本刊《中國學術》2001年第4期），那是到目前為止關於《點石齋畫報》最好的研究成果。瓦格納回信說，他關於晚清媒體的著作中譯本很快也要出版了。果不其然，2019年4月哈佛會議見面，他當即送上油墨



德國海德堡大學漢學家魯道夫·瓦格納 (Rudolf G. Wagner)

香的《晚清的媒體圖像與文化出版事業》（台北：傳記文學出版社，2019），說是剛拿到兩冊樣書，讓我先睹為快。

在2019年春哈佛大學主辦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，瓦格納和我各做一個主題演講，我的《從“觸摸歷史”到“思想操練”》基本上是匯報已完成的工作，瓦格納研究百年前通信、宣傳與國際參與者的作用的文章不一樣，是全新的題目，更具開拓性。4月28日，瓦格納夫婦約請我和夏曉虹在南北家園吃飯，席間談的全是他的資料發現，還說準備再找機會去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看檔案。大家聊得很盡興，相約2020年秋天，乘葉凱蒂學術休假，我請他們到北大住一段。

9月2日我給葉凱蒂寫信，說已跟北大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談妥，請他們夫婦來做一個月或三個月的研究。凱蒂的回信讓我大吃一驚：“瓦格納近來癌症復發非常厲害。一時無法制訂旅行計劃。我會把你的來信的信息告訴他。過一陣子，我會再寫信給你。”此前凱蒂確實告知過瓦格納身體不太好，我們猜海德堡大學編致敬文集與此有關，可見面時看他雖略顯消瘦，還是意氣風發，只字不提病情，只說馬上回海德堡，可以潛心寫作，讓我們大為寬心。

而且，5月13日我們還收到瓦格納的郵件，討論如何借助《字林西報》數據庫了解上世紀二十年代前後在華外國人的活動：“關於上圖徐家匯分館的《字林西報》數據庫的貴消息收到了，多謝。海外有兩類包含《字林西報》的全文數據庫，用的很方便，但是，1918、1919、1920、1921部分不在其中。記得

上圖做這張報紙的pdf，所不知道是這些pdf只是照相還是全西文能探索？關於上圖倉庫里《字林西報》的具體記錄在哪裡能找到？……很對不起，麻煩您，但為了研究五四的跨文化環境，已經找到的檔案資料外這類報紙太重要。”中間還有一大堆問號，涉及具體操作方案等，我和夏曉虹技術都不行，只好請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學生給他詳細解答。好在兩天後接到來信，說問題解決了：“燕京圖書館有了，從他們那裡我需要的資料都下載了。”

因剛從美國歸來，來不及申請簽證，6月26日海德堡大學為瓦格納教授舉行的慶祝會，我們雖提交了文章，但沒能參加。不過讀凱蒂來信，还是很開心，因確認瓦格納仍在推進研究工作：“大會的最後的節目是瓦格納講話，與哈佛的講話又增加了新的研究內容，十分精彩。講完，全會躍起鼓掌，大家都很激動。”只是7月15日葉凱蒂的統一回信，讓人有不祥之感：“再次感謝您加入這書的編寫！魯道夫請我感謝您。因為他目前面對健康問題在醫院住院。他希望我告訴您，一旦他離開這個醫院環境，他會單獨寫信給您，謝謝您。”

10月27日清晨，收到噩耗，我當即在朋友圈貼出他的《重建思想的眼界——跨文化視域下的概念史研究》，並寫下這麼兩段話：“剛接葉凱蒂來信，瓦格納先生昨晚在海德堡家中謝世，不勝哀傷。今年四月，還在哈佛的會議上聽他談論最新發現以及下一步的工作計劃。六月海德堡的致敬會，因時間衝突沒能參加，我应邀撰寫專業論文，夏曉虹則送上隨筆《漢學界的“廣大教主”》；“《世說新語》謝安語：‘中年以來，傷于哀樂，與親友別，輒作數日惡’——更何況此別是永別！轉四年前北大‘胡適人文講座’後，瓦格納教授的答問，可以大致了解其學術經歷及趣味。”

如今為美國亞洲研究年會(AAS)3月20日的紀念活動撰寫发言稿，眼前不斷晃動的，是瓦格納教授波士頓午餐後飛車離去時揮手告別的身影——如此充滿激情與活力的為學術的一生，讓人永遠感懷。

2020年3月1日於京西圓明園花園

（作者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）

顧千里校本《元朝秘史》札記

## 被淹沒的“無名氏”

李慶

跟隨著顧千里校本《元朝秘史》展開，涉及了許多問題，現在還是要回到該書本身。

顧千里校本《元朝秘史》，因其抄本轉到海外，葉德輝觀古堂又據其抄本刊刻問世，漸受重視。

有意思的是，葉德輝觀古堂本收了張穆和錢大昕的跋，雖也收錄了顧千里的跋，卻將其作為“無名氏”。其實，葉德輝在“丙午”（1906）“嘉平四日”的跋文中，提到過顧千里（葉德輝題跋，見《湖南近現代藏書家題跋選（一）》，中華書局，2009）。但他在刻本中卻作為“無名氏”，如此處置，不知何故？而葉德輝之所以會1907年刊刻此書，恐怕和他從日本學者那裡聽到的有關此書的消息有關（關於葉德輝和日本學者的聯繫，見他和諸橋轍次的筆談，載《東瀛遺墨》）。葉德輝的抄本，據觀古堂本《序》，乃得自馬進遠（其人具體情況待考），而馬氏乃“百金得自書肆”。葉德輝後得金蓉鏡資助，方得刊行。金蓉鏡（1855—1929），初名鼎元，字春壽，又字學范，號子鏡，後更名蓉鏡，字香嚴，句甸丞，又句閣伯、潛庵，晚號香嚴居士、香嚴庵主，香严头陀，就李乡民，秀水（今嘉興）人。

可見，此書流傳中，顧千里之名，其實被隱存了很久。直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，才逐漸被文學學者關注（見拙著《顧千里研究》252—290頁，不贅）。這種情況和鮑廷博相似，鮑廷博抄補的《元朝秘史》文本雖然流布很多，但多賴陳垣先生提出，才漸漸被關注。

歷史文獻流傳中，許多做出貢獻的人物，往往被淹沒在歷史的陰影之中。

關於顧千里校本的本身，最後入藏北京圖書館的經過，據傅增湘《〈元朝秘史〉跋》：“此書舊藏盛伯義祭酒家，癸丑歲（1912），意園藏籍星散，余偶見之正文齋譚篤生許，因告菊生前輩，為涵芬樓收之，而余為之諧價焉。”

可知盛昱身後，藏書四散，此本被書商正文齋譚篤生從盛昱處購得。考譚篤生，名錫慶，字篤生，河北冀縣人。據孫殿起《琉璃廠小志》：“正文齋，主人譚錫慶，……于光緒二十五年開放（先于光緒十六年在文昌會館經營數年）後設肆于東路南，所藏多古本精抄家訓之書。”（孫殿起《琉璃廠小志》，北京出版社，1962，第105頁）

倫明云：“清同治年間，朝廷將官中修繕不及的藏書送到官外書肆裝潢修補，或經辦事人之手，或被官人監守自盜，內府藏書開始散失出官。在海王村琉璃廠書肆中，譚篤生開設的正文齋，就是專靠從大監手中購得的偷盜之書起家的，譚氏精鑒別，又善結納，于光、宣年間執

書業之牛耳，庚子亂後最為有名。”（見倫明《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》，北京燕山出版社，1999，第133頁）

此事被傅增湘得知，發現為顧千里的校本，向張元濟先生推薦。所以，張元濟先生將其購入上海涵芬樓。正因為是傅增湘推薦，所以到1931年，陳垣先生要研究《元朝秘史》，請傅增湘從涵芬樓借出，此書才得以免受戰火之災。

此後，1936年，有商務印書館將顧校本影印收入《四部叢刊》三編之舉，而當時趙万里發現故宮內閣大庫所發現的明刻本的41枚殘葉，用以替換了抄本中的相應部分。《四部叢刊三編》本因此成為該學界最受歡迎和普遍使用的本子。

上世紀五十年代，商務印書館“公私合營”（見張人鳳、柳和城《張元濟年譜長編》，下冊，1953年11月紀事，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，2012），此事由當時作為“公方”即國家文物部門負責人的鄭振鐸先生經手。在此期間，顧千里校跋的此書入北京圖書館。據筆者請教張元濟先生之孫張人鳳先生，當時張元濟對於商務印書館和他自己的藏書，大致分為三種情況處置：其一是完全捐贈給國家，如《永樂大典》殘本和其他一些善本；其二是賣給國家，譬如當時藏在金城銀行內的一些宋元善本；其三是公私合營而歸于公的（以上，是筆者對人鳳先生原話的理解，如有誤謬，責任在筆者）。《元朝秘史》究竟屬於上述三類中的哪一類，容再考。

總之，《元朝秘史》，從14世紀中葉以來，經歷元朝和明朝的鼎革變故，經歷八國聯軍入侵的動亂，躲過了日軍侵華炮火，波折跌蕩。此後化身萬千，顯于世間。如今，顧千里校本本身，靜靜地躺在國家圖書館的書庫中。這在中國古代典籍的流傳史上，頗為罕見。

這部著作，成為元代歷史和蒙古民族研究的最重要資料之一，走向了世界。它的經歷說明，當今世界文明，是在互相爭鬥和交融中形成發展的。從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，漢文古籍作為記載人類文明形成的重要資料，有其自身獨特的價值。

這部著作，走到今日，和無數的學者發生了聯繫。離開了這些具體而真實的聯繫，也就談不上生動的學術發展史，文獻就成為僵硬的紙片，沒有生命力。探究其流變過程中的細節，不僅是為了記住歷史上為此付出心血的知名或不知名前賢的貢獻，更是為了強調，任何一種科學的研究，都是在前人的學術積累基礎上，才能前進。此乃從事學術研究的根基所在，若非如此，則不足言也。

（作者為日本國立金澤大學名譽教授）